

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袁柏顺，郑朝阳

〔摘要〕传统勤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价值系统为目标、以行为导向系统为引领、以规范系统为调节、以支撑系统为保障协调统一的文化系统。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虽然面临古今差异的问题，但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历史路径依赖让传统勤廉文化的“两创”具备了可能。传统勤廉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是：旗帜鲜明地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科学制订与落实勤廉制度规范、推进“勤、绩”和“廉、民”的行为导向内在统一、推动支撑系统的全面转化发展，从而实现新时代勤廉文化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撑系统的内在协调一致。

〔关键词〕勤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软实力

〔作者简介〕袁柏顺：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廉政学基础理论、廉政政策分析、反腐败比较研究、全球腐败治理；郑朝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九大以后，各省份先后明确提出了“清廉”地域的建设目标，诸如“清廉浙江”“清廉内蒙古”“清廉湖北”“清廉湖南”“清廉山东”“清廉河南”等，体现了新时代全国各地对清廉建设的高度重视。与之有别的是，江西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勤廉江西”的建设目标，“全面建设勤廉江西，政治生态呈现新气象。”^①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着力建设“勤廉龙江”，“勤为政要、廉为政本，勤政清廉是龙江振兴发展的重要保证。”^②浙江省永康市利用其丰富的勤廉文化资源，与学术团队合作，开展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勤廉指数的构建与实践^③。“勤廉”之于“清廉”而言，在保持廉洁从政的基础上，其内涵的维度大大拓宽，适于解决当前的“不勤”和“滥勤”问题。具体而言，当前部分地

区干部存在“懒政”“惰政”的“不勤”现象，以“形式主义”“拖延”来应对多重现实问题^④；同时存在“政绩综合症”的“滥勤”现象，诸如频繁“换赛道”、盲目“铺摊子”、急于“出政绩”等，浪费了治理资源。追根溯源，新时代“勤廉”目标的提出并非一时的，而是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深厚历史传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价值的。“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经典理论观点，其出发点是政府的属性为“恶”，因此政府仅需要维持社会秩序等最低限度的职能，充当“守夜人”，也可称之为消极的“无为政府”。与此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勤”的要素，尤其是儒家的责任文化，要求官员和政府均要有所作为、造福一方，因此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19ZDA13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江西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全文〔EB/OL〕.（2021-11-30）〔2023-10-25〕.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1/11/30/art_5442_3766926.html?eqid=ad638a9f0002a7770000000664268868.

②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全文来了〔EB/OL〕.（2022-05-05）〔2023-10-25〕. <http://www.hljtyzx.gov.cn/web/article/fea22a8e038a4c00a30b44625b02ae4c>.

③ 参见：许然，地方政府如何既勤又廉？浙江永康试水构建勤廉指数〔J〕.廉政瞭望，2023（17）：38.

④ 参见：薛瑞汉，建立健全干部改革创新工作中的容错纠错机制〔J〕.中州学刊，2017（2）：14.

延续了积极的“有为政府”的传统。2013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③一方面,传统勤廉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勤廉”是延续积极的“有为政府”的重要文化元素,是在与西方竞争中争夺话语权、彰显中国独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因此,研究清楚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价值。

一 传统勤廉文化的系统构成

中华传统勤廉文化并不是狭隘的独立要素,而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文化系统。对勤廉文化概念的界定是理解勤廉文化系统的基础。本文认为传统勤廉文化是一种勤廉并重、以利民为本、以治绩为衡的价值系统、规范系统、行为导向系统和支撑系统的系统集成,其中,以价值系统为目标,以行为导向系统为引领,以规范系统为调节,以支撑系统为保障。

(一) 价值系统

勤廉并重是官德和政德的有机统一,也是传统勤廉文化系统要实现的目标。早在秦简《为吏之道》中,就蕴含着官德与政德相统一的价值,“精(清)洁正直,慎谨坚固”是对官员“廉”的要求^④，“除害兴利,慈爱万姓……百事既成,民心既宁”^⑤是对官员“勤”的要求,此乃从政“之经”。同时,《为吏之道》也对官员做了道德上的引导,“吏之五善”中“精(清)廉毋谤”和“举事审当”着眼于“勤廉”方面的要求^⑥。就政德而言,“精(清)正守事,劝毋失时,兴利除害”皆是对政府勤廉为民的要求,此乃治国和治官“之要”^⑦。梁启超将“清、慎、勤”视为官德官箴^⑧,前二者即廉洁、自律,后者则是勤政,是勤廉并重的勤廉文化的核心。勤廉于政事,并非仅仅忙于迎来送往、案牍劳形,而是要真正符合为官的价值要求,有所作为。唐代李朝隐不避权贵、爱护弱民,而被荐为御史大夫。而也因“无所纠劾”被调任闲职^⑨。政府有所作为,要根据当时不同地区的需要来规划和实施。以水患和匪乱治理为例:水患自上古时期以来,就是广大民众的巨大威胁,禹正是因为“勤于治水”而得到了民众的爱戴^⑩;北宋苏轼担任地方官时,治理水患,心系百姓,甚至变卖家产,为地方百姓修建河堤以保障百姓生活^⑪。匪患是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百姓深受其苦^⑫,明代王守仁任地方官时,运用户籍管理、兵法策略以及招降安抚等办法,解决了当地为祸多年的匪患问题,百姓视他若神祇^⑬。

(二) 行为导向系统

勤廉不仅是抽象的价值规范,更是官员和政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N]. 人民日报, 2014-01-01 (1).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3.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G].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203.

④ 参见: 贾育林. 中国古代廉政法律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D]. 中国政法大学, 2006: 61.

⑤ 曹勤. 睡虎地秦简法律思想研究 [D]. 西南大学, 2014: 29.

⑥ 参见: 曾仲珊.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数词和量词 [J]. 求索, 1981 (2): 91.

⑦ 陈松长. 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 [J]. 文物, 2009 (3): 79.

⑧ 参见: 逮雯丽. 梁启超德育思想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0: 35.

⑨ 参见: 刘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127.

⑩ 参见: 姚汉荣. 《天问》中的图腾和神话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 (1): 31.

⑪ 参见: 杨静雯. 苏轼寓惠时期的交游、文学研究 [D]. 重庆大学, 2020: 8.

⑫ 参见: 郑彦卿, 郑晨阳. 匪患与覆灭: 民国时期宁夏的匪患与新中国的剿匪 [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22 (2): 64.

⑬ 参见: 孙君恒, 张玉琴.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证 [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3 (9): 75.

府的行为导向模版。从顶层设计来看,勤廉应以利民为本,以治绩为衡。勤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也应接受总体政治文化的导向。孟子提出“民为贵”,将“民”置于“君”与“社稷”前;唐太宗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①;金世宗将地方“民悦”与“超升”挂钩,职务低级的官员得到“民悦”,往往其上官会厌恶他,而能“承事上官”的官员,往往得不到“民悦”,对于前者,其绩果善可“超升”^②。北宋名臣胡则是勤廉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为官47年,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两任计相,廉洁自律,“历践清要”^③;“出处三朝,始终一德”。他勤于政务,勇于任事,每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④。他任福州知州时称:“百姓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弗从,刺史可废矣”,主张舍官身保庄田。他任三司使即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最高长官时,奏请改革盐制,“改官卖为商销”,为此不惜得罪权贵而被贬为知州。他任工部侍郎时,曾为大旱赤地的江南十四州奏免身丁钱^⑤。毛泽东同志赞评胡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北宋时期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的一名清官”^⑥。

(三) 规范系统

规范系统主要通过官员的选任和考核,调节官员的行为,以符合勤廉的价值目标。其中,考核规范是“勤廉文化”的重点。“勤廉”在考核规范方面起源甚早,早在尧舜禹时期,勤廉作为一种考核的属性就有所体现。舜命皋陶担任刑狱之官,“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⑦其中的墨就明显指向廉的层面,指“贪以败官”,贪得无厌、败坏官纪,要被处以死刑。而若是在朝觐大

事上有所懒惰,考勤迟到,也要被处死,“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⑧商朝伊尹提出“三风十愆”的惩罚规定从反面界定“勤廉”的重要地位^⑨。在西周时期,“治政”与“财用”已经成为官吏勤绩考核的明确规定,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⑩秦朝考课制度全面发展,在对耕牛、官马等农用、军用和公共物资的考核中,勤绩是重要的内容,诸如因负责官吏的问题造成耕牛减絮、马匹体态不佳、马匹劳绩下降等,都要对相关官吏进行处罚^⑪。金世宗明确将“忠勤廉洁”的地方官作为应“进贤”的典型代表^⑫。宋朝时期,“勤廉”明确成为官吏考核规定的主要内容。北宋景德初年,地方诸道考察所部官吏时将其分为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⑬可见,这一时期对于勤廉的考察已经有了十分详细和科学的方案,“既勤且廉”为上等,“廉而不勤”和“勤而不廉”为次等,“不勤不廉”为下等。就选官规范而言,古代选官主要是分为察举制和科举制。察举众科目中,又以孝廉之举为重中之重。此后的“九品中正制”虽演化为世家门阀仕途之制,但从名义上也要对“德才”进行评级^⑭。

(四) 支撑系统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支撑系统的保障作用。文化的支撑系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存发展外延中的社会制度。因而,传统勤廉文化的支撑系统可以分为正式制

① 吴兢.贞观政要·君道第一[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83.

②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4.

③ 胡则.胡则集[M].胡敬,程凤山,辑.胡联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

④ 参见:胡则.胡则集[M].胡敬,程凤山,辑.胡联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95.

⑤ 参见:胡则.胡则集[M].胡敬,程凤山,辑.胡联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5.

⑥ 鲍志成.北宋清官胡则及“胡公大帝信仰”[J].东方博物,2005(4):105.

⑦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61.

⑧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126.

⑨ 参见:孟祥才.中国古代防腐反贪中的反腐败文学[J].山东高等教育,2014(11):90.

⑩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3.

⑪ 参见:焦春鑫,杨玉仁.秦朝考课制度探析[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3(2):16.

⑫ 参见: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4.

⑬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759.

⑭ 参见:任怀国.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J].江海学刊,2001(4):121.

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方面^①, 主要是奖惩机制和道德舆论。

第一, 奖惩机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可以作为一种认识官员行为逻辑的一种重要视角, 官员的行为有很大可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②。在历代正式制度的设计中, 官员的奖惩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参照“勤廉”要求的职务晋升是给予官员的稳定可预期的利益增加, 而部分违背“勤廉”要求的官员则会受到制度性的惩处。一方面, 从制度运行来看, 中国自古强调“勤廉”等道德调节的基础性作用, 具备“勤廉”评价的官员能够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和更快的升迁速度, 在部分时期, “勤廉”甚至成为古代官员晋升的决定性因素^③。另一方面, 从制度文本来看, “勤廉文化”在职务晋升中的重要性, 在上文的考核规范和选官规范论述中已经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 道德舆论。道德舆论是古代国家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伦理是儒家提倡的重要内容, 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的儒家君子标准往往是评价官员的理想标杆。自从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统治思想, 尤其是唐宋以儒家经典科举取士后, 广大正途官员均是熟读儒学经典之辈, 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 官员的负面行为不仅会导致其内心的煎熬, 而且会遭到监察系统的诘问弹劾^④。古代官员的德政也与民众舆论息息相关, 古代官员为了保持在民众中的清誉, 面对两难之境时, 宁愿被皇帝严重处罚^⑤。“一心为民, 造福一方”, 在离任或者去世之后获得树碑立传, 是官员们梦寐以求的道德成就^⑥。地方民众对于清廉官员请求留任, 制作“万民伞”亦或是修建“庙宇”以示纪念, 更有甚者对其神化加以祭祀^⑦, 这些都是对官员的巨大肯定, 同时也是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以胡则为例, 因其

“生有惠政, 歿祭于社”, 从宋代“浙水之东, 祠庙相望”, 到元代“祠庙布满郡境”, 再到明代“两浙之境, 庙貌相望”, 清代“浙东千里, 几无一邑一乡无公庙”。胡公信仰文化延续至今, 被民众世代敬仰, 成为官员践行“勤廉”文化的巨大动力^⑧。

二 历史演化中的“勤”“廉”关系

传统勤廉文化的“勤”与“廉”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经历了有所偏颇到勤廉并重的过程。二者兴起于西周, 并称源于魏晋, 统一于明清。总体而言, “廉勤”与“勤廉”的表述兼有, 但以前者为多, 可能反映出古代对“廉”侧更高的重视度。而在二者的对比方面, 一方面, 在历朝官员选任和考核制度设计上, 勤廉方面各有侧重。另一方面, “勤廉”规定实际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发挥, 因政治环境、综合国力和君主开明程度而参差不齐, 也相应地导致了“勤”和“廉”的导向有所差别。

两汉时期, 就已有“酷吏”和“循吏”的角色分野。循吏也被称为“良吏”, 他们兼具“勤”与“廉”, 树立了道德与政绩均优良的官员的典范和评判的价值标准, 但总体晋升较慢。与之相对而言的“暴力”求绩的“酷吏”则逐渐成为不顾“廉”侧的“恶吏”的代名词^⑨。酷吏往往急于求成, “其治暴酷, 专任刑罚”, 短期内就能打造“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地方稳定治安环境, 政绩的高效和突出让他们获得了快捷的升迁机会^⑩, 从而挤占了“廉”侧的价值空间。唐朝时期, 由于“盛世”带来的复杂治理任务, “廉勤”也偏向于对官员“政务”才能的肯定, 尤其是对“军政”“太府”“会计”“转运”等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

① 参见: 孙铮, 刘凤委, 李增泉. 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05 (5): 54.

② 参见: 倪星, 王锐. 从邀功到避责: 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J]. 政治学研究, 2017 (2): 42.

③ 参见: 任勇, 周飞.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化重塑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 36.

④ 参见: 薛小建, 张富利.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95.

⑤ 参见: 顾则徐. 追求上级评价和眼前利益不是德政 [J]. 西部大开发, 2014 (10): 25.

⑥ 参见: 卢春龙. 理解中国式责任制: 道德的内嵌性、干部与群众价值的一致性 [J]. 理论学刊, 2018 (4): 110.

⑦ 参见: 寻扣. 明代生祠研究 [D]. 西北师范大学, 2022: 46.

⑧ 参见: 胡则. 胡则集 [M]. 胡敬, 程凤山, 辑. 胡联章,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101-102.

⑨ 参见: 林存光. 儒家的仁爱政治观与循吏文化 [J]. 孔子研究, 2008 (5): 96.

⑩ 参见: 孟彦. 汉代循吏初探 [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40.

而对清廉爱民等价值要求,相对弱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酿成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祸患。宋朝突出“廉勤”中“廉”侧的价值内涵,将“廉勤”视为对官员政绩德行的高度评价,作为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直至明朝时期,“廉勤”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实现了治政才能、治政德行和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清朝时期,“勤廉”集先前“德、才、绩”等内涵于一体,实现了官德政德的价值规范化和普遍化,成为“官箴”的主要内容,“清慎勤”三字也多见于衙署公堂匾额^①。

三 传统勤廉文化转化发展面临的系统差异

要实现传统勤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古今勤廉文化的差异。作为一种文化系统,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撑系统的差异性,均会对传统勤廉文化的“两创”产生影响。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转型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许多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各国优秀传统文化都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第二,新时代多种文化源流的内在差异,主要是指传统勤廉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不相符。“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③梁启超高度肯定了传统勤廉文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先行者的思想中,作为勤廉文化重要内涵的“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虽然较之臣民文化有所进步,但仍旧是某种程度的助力与对立关系,政府的义务在于“助人民自力所不逮”“防人民自由权之被(政府)侵”^④,与当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定位相去甚远。第三,古今勤廉文化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存在差异。传统勤廉文化的内部存在不一致性,主要在于勤廉文化的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撑系统之间存在背离,不能符合新时代勤

廉文化内部协调统一的要求。虽然传统勤廉文化的基本价值一脉相承,但承载其价值的政治制度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官员具体的行为导向也会受到官员品德和行为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一些时期,虽有勤廉价值的倡导,但具体考核规范与官员的行为却“以绩以利”,未能符合“廉”的价值要求。

(一) 价值系统的差异

第一,官员价值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流向是自上而下的,“明主治吏不治民”,君主通过委托官吏来治理广大百姓,从这种视角来看,君主是统治者,也是委托人,官吏是代理人,而广大百姓就成为被统治者。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在君主与官吏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勤廉”是君主为防范官吏“撒谎、偷懒”等风险而设计的“束官之道”;而在官吏与百姓之间,由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根本性,“勤廉”就变成了君主所期望的“牧民之道”,各地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和“大老爷”,“勤廉”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广大臣民,进而稳定天下。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兼有“重民主义”“民本主义”,但依旧改不了其等级社会的本质。而步入现代文明后,民众主体意识觉醒,政治参与权利扩大,臣民早已转化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兵民是胜利之本”,做人民的“勤务员”是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职人员都是“人民公仆”,角色模板由“大老爷”转变为了“勤务员”,当“牧民”早已丧失合法性后,以“利民为本”的“勤廉”可能成为理论上的最低标准,而不是古代的最高要求。第二,政府价值的变化。在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中的中央政府,往往是“全能政府”,包办一切,这是中央权威和意志的体现。村民和臣民,不仅不具备法律赋予的政治参与权利,本身也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良民”的角色模版也往往是安居乐业、耕种农桑的农民,至于地方治理、天下兴亡等国家大

① 参见:郭建.匾额楹联:明清时期县衙的“标配”[J].文史天地,2021(11):15.

②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EB/OL].(2023-09-29)[2023-10-25].http://new.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309/t20230913_111142009.shtml.

③ 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0.

④ 吴汉全.梁启超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J].学术界,2023(1):172.

事,都是由广义的政府部门来完成,而在“简约主义”的治理策略下,古代政府注重治理成效,忽视治理过程,因此也给予了完全以政绩为中心的“酷吏”的生存发展机会,以至挤占了以爱民守礼为方针的“循吏”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民众对政府“又爱又畏”^①。而当今时代,政府转职能、转作风,着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多元参与主体中的重要一元,但不是全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二) 行为导向系统的差异

在古代勤廉文化行为导向中,“勤、廉”与“民、绩”二者内部和相互之间往往是割裂的;而在新时代勤廉文化的行为导向中,“勤、廉”与“民、绩”是协调统一的。就古代中央统治者所推崇的勤廉文化而言,往往是重“勤”重“绩”,而轻“廉”轻“民”。在短时间内通过“严刑峻法”“穷治牢狱”等手段,能够肃清匪寇、平息民变的“能臣干吏”,往往会受到皇帝重用,乃至“超擢”,前文所述的“酷吏”都是此类情况,由于治理问题的急迫性,官员自身的清廉与否、是否为民众所拥护,不但会被其上级官员选择性隐瞒,也时常被中央有意忽视;而循规蹈矩、道德高尚的清廉官员,虽然一般都能得到民众的尊敬和同僚的敬畏,但其晋升速度与晋升机会均是远远不如前者的。那些出于皇帝树立“道德模范”的政治目的而嘉奖的清廉官员,在同期官员中少之又少。当今时代,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在干事谋事创业的过程中,必须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干事创业的“政绩”最终是为了人民,因而必须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来看,新时代勤廉文化中“勤、绩”与“廉、民”的行为导向要求是统一的。

(三) 规范系统的差异

“勤廉”文化在古今选官考核规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古代的勤廉规范难以适用于现代。古代

的“勤廉”虽然在选任考核规范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选任考核更多的是依据上级评价以及中央意见,其中“人治”色彩浓厚,官员的选任考核通常会受君主、上级官员个人好恶的影响。汉高祖刘邦任用的高级官吏多有一定的贪贿问题^②。汉武帝任用张汤、桑弘羊等“兴利之臣”,为其大肆搜刮钱财^③。此外,官员选任考核的“勤廉”规范也因国家环境而有所差别。一般而言,在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的盛世,政府重民倡廉。而在国力衰弱、政治黑暗的末世,勤廉则失去生存空间。而当今时代,“勤廉”作为一种官员职责规范已经被明确写入正式制度之中,以制度来规范官员的选任和考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总则第一条明确指出了公务员的岗位要求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将“勤政务实”和“清正廉洁”并列的同时,还将“为民服务”置于重要地位。

(四) 支撑系统的差异

就正式制度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差异。“政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的方面,即权力的所属和运行;二是“治”的方面,即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就前者“政”的方面而言,古代民众的地位与当今人民“国家主人”的地位存在根本性差别。古代民众基本被排除于政治之外,不能获得基本的政治参与权利,缺乏监督政府的能力,主权“在君”,即在政治中“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古代“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民以举发人的身份检举揭发官吏,双方不能平等对簿公堂,在部分朝代甚至民要先“受罚”^④。因此,古代官员是否“勤廉”,难以受到普通民众的约束。就后者“治”的方面而言,其治理体系奉行“简约治理”思路,过于注重“成效”^⑤。古代治理体系相较当代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而言,还是显得比较落后。中央对于多重复杂的治理任务,往往以治理结果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在勤廉等方面难以做到全过程管理。而“权大于法”的治理传统,更是让治理制度中勤廉效

① 孟彦. 汉代循吏初探 [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41.

② 参见: 邱涛. 中国反贪制度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 53.

③ 参见: 邱涛. 中国反贪制度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 67.

④ 樊泓池. 腐败发现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D].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10.

⑤ 钟莉莉. 简约治理传统对平衡现代“乡村政治”关系的启示 [D]. 吉林大学, 2023: 72.

用的发挥雪上加霜。此外，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还蕴含着大量的结构性问题，诸如部分朝代官员俸禄过低、奖惩体系不科学、升迁通道单一等，传统勤廉文化更加难以直接移植于当代社会。如明朝海瑞，一生清廉，其终时竟无钱下葬^①，此种“凄凉”下场，使“清廉”难以为后人效仿。清朝，许振祜治理河患，监督工匠甚严，革除了“中饱私囊”之弊，然而如此“勤廉者”，也只能“治标”，取得“一时之效”，非“治本计也”^②。就非正式制度而言，主要是指社会道德观念的差别。社会观念能够影响勤廉文化的传播和效果。受制于历史条件，中国古代社会“臣民”观念兴盛，对政府“服从”的认同胜于对官员“责任”的认知；而现代文明是人民主体的文明，公民意识觉醒，对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权利和责任的古今观念冲突也会构成传统勤廉文化转化和发展的挑战。

四 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两创”的实践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在文化传承方面颇有解释力。经过中华数千年历史沉淀，传统勤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勤”与“廉”作为两种文化要素，能够通过制度学习从旧制度转移到新制度的载体上^③。传统勤廉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的与时俱进，更需要其配套系统的迭代升级。“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因此，传统勤廉文化的“两创”不仅要对其价值进行转化发展，更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承载勤廉价值，通过监督管理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为新时代勤廉文化发展提供新支撑，从而实现新时代勤廉文化价值系统、行为导向系统、规范系统和支撑系统的内在协调统一。

（一）价值系统的转化发展

旗帜鲜明地树立新时代勤廉文化“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内涵。在传统文化中，“勤廉”的价值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上的，通过勤于“治民”，实现统治目的。新时代的勤廉文化要继承传统勤廉文化中勤廉并重、重视治绩等价值内涵，并赋予廉洁从业从政、高质量服务民众、干事创业造福民众等新内涵，以清晰的规划蓝图“一根尺子量到底”。明确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管是“勤于政事”还是“廉洁自律”，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章》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其中“清正廉洁”与“勤政”都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表现。

（二）行为导向系统的转化发展

新时代勤廉价值的实现需要继续推进“勤、绩”和“廉、民”的内在统一。传统勤廉文化内在行为导向的割裂性，大大限制了其历史作用的发挥。新时代勤廉文化的行为导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勤廉并重，要“始终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反腐败”。在新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腐败作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的滥用，虽然腐败可能会产生显著的“短期政绩”，但其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与人民所期盼的“理想之政”相去甚远，不应出现在新时代勤廉文化的导向之列。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勤廉并重政绩观，就必须持续优化干部选任体系，优化督考评制度体系，试行“勤廉指数”创新体系。努力培养“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选拔任用一批民众与基层人员高度认可的，廉洁上立得住的，想干事、能干事尤其是干成了事的干部。以先进引领形成示范效应，大力宣传组织放心、民众称颂的党员干部代表。持之以恒地开展党风党纪教育，推动党员干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严格的监

① 刘万里. 论晚明狂人——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J]. 北方论丛, 1999 (5): 14.

②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553.

③ 参见: W.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116.

督管理规范干部的行为。

(三) 规范系统的转化发展

新时代勤廉价值的发挥需要科学制订与落实勤廉制度规范。中国古代“勤廉”的规范强度相对较低, 主要依靠激励性措施以鼓励“勤廉”行为的实现, 而与之相配套的强制性惩处措施相对不足且落实较差。其中的激励点也更偏重“勤”的方面, 而对于“廉”的方面通常是选择性忽略。因此, 新时代“勤廉”规范的禁止性、激励性等相关制度设计应更科学, 更注重关键监督与全面激励。在制度供给上, 增强激励性制度供给并扩大其作用空间。过去一段时间里, 对勤廉的激励, 主要依靠理想信念教育, 而忽视了基础性制度的完善。诸如党员干部违纪后, 要面临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适用问题, 而其内在转化主要依据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而非实际的治理勤绩情况。党员干部的“勤廉”考核规范, 仍是以上级的评价为主, 至于民众的爱戴仅仅是“锦上添花”, 无法将勤廉文化的价值深化于政治之中。在制度规范中, 纪委监委往往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 使广大忙于日常政务的基层干部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因此, 可以研究制定试行纪委监委的角色转换模式,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由监督者转换为激励者, 同时还要避免监督执纪问责标准不一、损害制度权威性与偏离价值导向等问题。在制度实践中, 以高质量管理与监督落实制度、规范行为。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 激励与约束并重, 不断完善容错纠错、精准监督、澄清正名、回访关爱的激励机制, 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让广大党员干部既能够在“廉”的约束下行事, 也能够符合“勤”的创业干事担当的要求。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要真正将激励机制落到实处, 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四) 支撑系统的转化发展

政治生态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土壤, 对党员的思想 and 行为会产生深刻影响^①。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是指各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清正廉明的从政环境^②, 新时代勤廉文化需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予以支撑。在“勤廉文化”方面, 要推动政治生态的净化优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重要实现途径, 前者依靠人民的监督和参与重点解决“不敢不勤廉”的问题, 后者从国家制度现代化上解决“不能不勤廉”的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理论是其思想指导, 从党员干部思想价值的角度重点解决“不想不勤廉”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 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才能实现。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扩大人民参与渠道, 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而在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中体现人民民主的分量, 将人民群众的评价纳入干部评价体系, 不忘“依靠人民的监督”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以更好地解决“不敢不勤廉”的问题。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勤廉文化的支撑系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 需要与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协同一致。国家治理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为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设置了严格的规范和明确的导向, 从源头、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做出了具体要求, 通过扎牢制度的笼子, 确保政府和官员“不能不勤廉”。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价值泛指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③。价值信念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非强制却又持久的影响。要以人民为中心, 意味着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置于一切行动的首位, 作为其行动意义的最高标准。从思想价值上明确了人民的“中心性”, 能够使政府和官员树立良好的政绩观, 自发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从而实现“不想不勤廉”的目标。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要保障。制度环境对于营造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① 参见: 盛巧玲.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D]. 温州大学, 2022: 31.

② 参见: 桑学成, 周义程.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概念辨析与着力点考量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 (1): 1.

③ 参见: 徐猛.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J]. 学术探索, 2014 (5): 14.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①，从而将“不敢不勤廉”“不能不勤廉”“不想不勤廉”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文化支撑系统的优化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通过以上途径实现政治生态初步优化的基础上，还必须关注其持久推进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观念这一非正式制度层面，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建立社会信任。要以“化风成俗”的精神，像钉钉子一样持久抓好每一个节点，从而形成全

社会长久可立的行为习惯，为建立和培育新时代勤廉文化支撑系统提供持久动力。

不同时代总会提出不同的历史难题，赋予不同的历史责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永无止境，但绝不可以此为借口，拒绝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而是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突破当前的历史局限，将传统勤廉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独特价值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YUAN Baishun, ZHENG Zhaoyang

Abstract: Traditional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cultural system that aims to value, led by behavior orientation, adjusted by rules, guaranteed by supporting system. Alth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ace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ence of eras, the path dependency lasted throughout Chinese civiliza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is to clearly adhere to people-centered values, to scientifically design and carry out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rules, to propel the inner coincidence of diligence, achievement, integrity and peopl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system. Finally we will achieve the inner coincidence of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culture value, behavior orientation, rule and supporting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cultur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ultural soft power

About the author: YUAN Baishun,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Anti-corruption, Hunan University, specialist i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anti-corruption and global corruption governance. ZHENG Zhaoya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Marxist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2013-11-16 (1).